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与发展状况

□杜爱玲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51)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本土化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经历了引进、模仿和创新的学科主动建构过程并取得重大的成果,初步发挥了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批评、预测和指导的功能。

**【关键词】**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路径;发展状况。

**【作者简介】**杜爱玲,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文化研究。

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这些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是舶来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以来,本土化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化”又称为“本国化”“本地化”或“民族化”。本土化就是使外来事物发生转变,使之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主要是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被吸收、认同,进而内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最终融进中华民族文化、体现为中华民族性格的过程。

## 一、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背景与阶段

### 1. 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缘起。

(1) 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动机:知识分子的“失语”和文化危机下的觉醒。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被视为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其他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往往从模仿和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开始。但是,这些国家在学习西方时没有考虑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照搬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出现了“全盘西化”“西方理论泛滥”的状况。

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起于清末。在民族和个人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从漫长的西学东渐运动到后来的“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较量中经过知识转换,从激进的“打倒孔家店”到“科学的春天”来了,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建立。但是由于急切功利而对西方新潮不加消化地吸收,传统文化

的“话语”慢慢地被西学置换。社会科学弥漫在“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中。他们以学舌西方为荣,学术上丢弃了本族语;他们喜欢用生冷偏僻字词,追求倒装及变形的句式和逻辑不清的繁杂复句,把本可以用通俗的母语、大众化的概念和简洁的句子描述清晰的内容,借用别人的艰涩话语表达来炫耀和显示高深。这种学术状况引起了学者的反感,由此激发了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的最初欲望。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直接涵义是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盲目追随西方这样一种做法的反对<sup>[1]</sup>。

本土化研究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警觉,西方文化殖民的压力与精神上的失落感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本土。学者们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话语转换致使知识分子“失语”,而“失语”使知识分子正在失去标志自我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话语系统。失语不但使本民族语言词汇衰亡,其深层次的问题是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异化。因此,失语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最可怕、最深层的权力标志。文化殖民主义的特点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扩张而达到殖民的目的,它是一种话语的扩张、精神的征服。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被西方中心话语所控制,那么该民族知识分子就成了西方文化的奴隶,不仅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语言,而且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于一个具有自己深厚文化积累和文化传统的知识分

子而言,彻底的精神搬家意味着自己将成为精神上的流浪儿。

(2)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对西方社会科学普适性的质疑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长期以来,社会学科都被冠以“科学”之名,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确定性。实际上,人们意识到,社会科学跟特定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显示出了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无论是出于直接的自然条件还是人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各民族的生产和交往活动都具有很大影响。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鲜明的历史条件制约性,它的阶级性很强。每个时代思想家的阶级观点、阶级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社会学说。

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方法,都已被证明负载着特定的文化蕴涵与历史期待<sup>[2]</sup>。不仅其理论和方法本身带有独特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与客观世界产生偏差,而且在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解释或者研究非西方社会时,也有可能由于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引发扭曲或误读。实际上社会科学并未严守价值中立,金耀基先生早就指出:“西方的学术优势与西方的政治优势不是毫无干连的,而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学术上求独立或扫除学术殖民阴影毋宁是政治上独立的精神支柱。”<sup>[3]</sup>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的骨髓里渗透着巨大的霸权力量,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客观上充当了文化殖民中控制与同化其他民族文化的手段。因

此,民族文化冲突主要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揭示西方文化的霸权性格和捍卫我国传统文化的尊严是社会学家的责任。如果说社会科学从西方的植入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渗透,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实质则是对西方社会科学普适性的质疑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展开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的主动承担。

2. 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发展阶段。“本土化”是在二战以后美国以外的其他第二世界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运动。巴西社会学家拉莫斯在1953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大会上首先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思想<sup>[4]</sup>。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大力开展是近30年的事。70年代以后,台湾的心理学家联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决定推动这一学术运动。1980年台湾“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国际研讨会”得到香港、大陆学者的积极回应。1992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湖北神农架召开有关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1994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社会心理学会年会,会上提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问题。1999年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此后我国本土化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

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按照其层次可以分为引进、模仿和创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引进和吸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1985年前后翻译的社会科学的专著和文章大量出现,这种状况持续到1989年。这种状况类似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形势——介绍西方社会制度的理论大量出现。几乎社会科学界大师及其思想,都在这期间翻译进来。这期间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由于受到前苏联影响较大,机械地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来编写社会科学教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本土化探索,如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1983)、雷洁琼指导下的“中国城市家庭调查”(1983)等,但总体而言本土化程度低。

第二阶段:90年代——尝试本土化阶段。1989年后的二三年,社会科学引进与翻译相对处于低潮。此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工作重新活跃,国外社会科学的翻译和引进又开启了规模化、系统化步伐。出版社、学校或权威人士组织专人以丛书形式或学术派别类型进行翻译前沿理论,如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思潮、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由此导致西化倾向迅速抬头,现象学、阐释学、建构主义、后现代语言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时髦话语,社会科学界逐渐作为西方思想的注解。这期间各种社会科学的教材和论著大量出现,但通病是学科体系上由模仿前苏联变为照搬西方,主要是欧美资料,形式和内容比较雷同,西化倾向抬头,本土化程度不高。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全球化、国际化下的本土化阶段。这个阶段除了国

外社会科学的翻译和引进规模化、系统化外,知识分子出于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本土化意识增强。一些专家和他们所带的研究生有意识致力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联系中国国情,出现了质量较高的专著和文章。在该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成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典范。随着“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的探索,本土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

##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内容演变: 从学科确证到特色建构

1. 社会科学自主性意识的增长与学科自我确证。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有两个不同层次内容,一是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在我国社会的適切性,二是借鉴其理论与方法论,完成学科的独立建设。本土化研究过程实际上也是学科的独立、成长与成熟的过程。其中学科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增长与学科自我确证是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为社会科学“去哲学化”的努力和元研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科的主动构建是本土化研究成熟的标志。

(1) 社会科学的“去哲学化”。长期以来,哲学被认为是一切文化之王和时代的精华,是一切知识的母体和根本。人类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最早也蕴含在古代未经分化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中。

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兴起是近二三百多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之事。大概从18-19世纪以来西方学科分化,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性资料,形成了以各种不同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学科。这些变化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纯思辨的性质。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言必称希腊”,如果社会科学理论缺少西方哲学论证则被视为不成熟、不深刻,学科地位不高。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科学出现了“去哲学化”努力,各类实用型专著大量出现,报刊杂志刊登大量的应用性文章,在政策分析和规划评估中资料数据分析显著增长。从学科发展本身来看,这种“去哲学化”是学科自身既综合又分化,向精细和实用方向发展,表现为:一是知识分化速度快,大量出现了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打破了以往哲学抽象思辨中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与孤立性,把学科间的隔离封闭状态变为多值关系和多维联系。二是使用调查统计与测量等数学工具进行量化研究,揭示社会现象的数量关系和复杂结构。社会科学的“去哲学化”努力,开创了新的学风,使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联系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

(2) 社会科学的元研究。20世纪欧洲哲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对语言的关注,“元哲学”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热点。受分析哲学的启发,许多社会科学也都开始了被称

之为形式化的元理论研究。元研究的内容是对学科自身的概念、命题和学科领域的语言进行反思与逻辑分析,目的是澄清和消除学科中隐含的混乱,明晰学科联系与学科边界问题。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学科的自我确证,因为这种反省和思索反映了学科“自我意识”的萌动,或是证明自己、或是试图否定自己或者修正自己重新寻找今后的发展道路。但是,我国社会科学元研究中本土化意识不强,大多数学者使用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来进行话语分析。学者们对中国某些话语,如俗语、隐喻等的社会学分析,可算是一项有意义的本土化研究。

2. 中国特色社会学科的主动构建。过去20多年来,中国社会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成功的经验被国际社会概括“中国模式”,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特征,例如混合过渡性、自觉建设性、经济先导性、政府调控性、文化整合性、发展模式创新性等等,这些特性使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经验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的主支,在漫长岁月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料重建历史与文化。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社会

科学的任务则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揭示发展规律,指导社会实践。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顺应这种转变,进行了学科的主动建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水平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sup>[5]</sup>。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包括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探讨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探寻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以及研究国际问题等<sup>[6]</sup>,初步发挥了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批评、预测和指导的功能。//

注释:

[1]杜斌、郑毓信:《评台湾“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载《学海》2001年第3期。

[2]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第2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期。

[4][美]费雷德里克·H·加鲁:《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大与日趋多样化》,周一骑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8年第4期。

[5]纪宝成:《新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载《光明日报》2009年1月6日。

[6]李铁映:《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5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